



中国近代社会
思潮研究丛书

生命的尊严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陈少峰 著

中国近代思想家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人道主义思想来确立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一方面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尤其是前近代思想贫弱现象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不足，即所谓「学问饥荒」使得人们转而对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不择巨细的吸取；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家历史使命的自觉，他们身上对于人道主义的积极实践态度。这些因素促使他们激起、奋起、热切，使他们殚思竭虑地探索人道主义的问题，融汇所有能够成为他们思想信念并赋予他们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观念，来成熟自己，唤醒民众，鼓起勇气向强大的封建主义宣战，并达成救民于水火，最终达到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目标。

——题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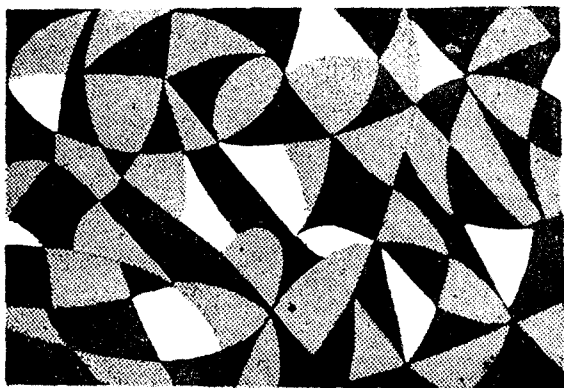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生命的尊严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陈少峰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徐 跃
封面装帧 任 意
美术编辑 王建纲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生 命 的 尊 严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陈少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02,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728-X/C·42

定价 12.00 元

DF88/13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 契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鉴平 刘志琴 何兆武

张利民 胡伟希* 高志仁*

高瑞泉*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丛书总序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思潮蜂起、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略举荦荦大端，其中即有进化论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思想的空前活跃，争鸣的空前激烈，精神的迅速高扬。就具体的思潮而言，它们可能是有得有失，有积极面有消极面，有的甚至可能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是，思潮蜂起的总画面表现了民族精神在寻找救国救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这一长期艰苦的探索中间，形成了值得珍视的近代文化传统。

谈及传统，人们通常容易只理解为古代传统。诚然，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决不是原封

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依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时代,西风东渐,文化的渗入,思潮的传输,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又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特点。即以我们前述诸社会思潮而言,它们中大部分经过了西方的媒介,但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它们在发源地时有相当的不同。中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近代严峻的历史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所有这一切,即古代文化传统在近代的转变,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近代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代文化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大多是在近代史上已经反复争论过的问题;某些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倾向完全可以在前几十年中找到模本,就不难理解近代文化的这种持续性、连贯性。其中,既有许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深入寻访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

因此,加强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把握近代文化传统,进而把握历史的流向,无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历史的反思,给现实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还几近空白。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是很令人高兴的。

本丛书的宗旨,是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对象,通过描述这些社会思潮的兴衰、演变、交错迭代的轨迹,提供一种研究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对某一社会思潮中的人物、流派、思想作动态的研究,并对其社会根源、影响及教训作多侧面的理论探

索；全套丛书汇总，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达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某种总体性理解。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我们希望借助这种研究跨度和研究方法，提高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多种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注意，同时也可以帮助一般读者对中国国情与近代传统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本丛书的作者，多为从事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敏锐、神旺笔健，学养也日臻丰厚。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多系他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现在奉献给读书界。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教，并因此有助于推进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冯 契

一九九一年七月

目 录

第一章 突现的主题	1
一、交叉的主旋律.....	1
二、概念的探本溯源.....	9
三、观念的行程与转机.....	21
四、启蒙运动与人道主义.....	33
第二章 主体的觉醒	50
一、人的价值自觉.....	50
二、康有为及其救世恒言.....	55
三、谭嗣同与《仁学》.....	67
四、自由的意义.....	76
五、少年与新民.....	85
第三章 爱的祈愿	97
一、殉道者的乐观主义.....	97
二、困惑与激情	106
三、人我之爱	112
四、孙中山：乌托邦与现实世界.....	117
五、蔡元培与人文思想的起承转合	127

第四章 理念的升华	142
一、新文化运动与人的主题	142
二、德、赛先生与个性主义	149
三、苍茫时分	158
四、理想的冲突	172
五、周作人与人的发现	181
六、地平线上的曙光	188
 第五章 呐喊与颂歌	 204
一、使命力量与思想境界	204
二、陈独秀：最后的觉悟宣言	211
三、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	217
四、李大钊：人道的警钟响了	225
 第六章 批判的超越	 240
一、历史影像的真谛	240
二、同声异响与同源异流	248
三、思想的回应——探寻者足迹的探寻	258
 后 记	 273

第一章 突现的主题

一、交叉的主旋律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革的力量蓄积,是既迟缓而又艰辛的。由于前近代思想资源的薄弱,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惰性抗阻,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和外部世界生动展示的最初背景下,虽饱尝内在情感观念世界的冲突、矛盾与苦痛,却迟迟未能觉悟和做出果敢的抉择,从而延缓了对这一历史契机的把握。然而,在各先进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反衬下,家国的落后和贫穷,无疑极大地刺激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林则徐、洪仁玕、洪秀全、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悲凉行吟,至改良派康谭诸人,已唱出殉道者的祈愿,发为救世救人与自我超越的呼喊。于是,阴云如铅的天际,轰响了亘古未闻的惊雷。思想的狂风骤雨般急剧跃进,标志着中国近代独特的思想革命时代开始了。

序幕一经拉开,各种社会思潮相继喷涌而出,并在交汇叠合中形成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尤为引人注目。它

不仅是各种思潮的交点,而且是近代思想的共同价值标准所在。人道主义思潮的丰富内容集中体现在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博爱(大同)这两条思想主线的同步、交叉与合致,它们奏出了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躁动不安与热烈向往的主旋律。

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与发展的主张,最初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包括社会、伦理、宗教等等)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价值信念。它是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重点,具有思想发展史上的普遍意义。而且,个性解放与发展的观念最终与资产阶级的权利思想结合,发展为个人主义的思想价值体系。虽然以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基石的个人主义所追求的“普遍”与“永恒”信念一开始就是局限性严重的单纯理想主义,因而一开始就与现实有着微妙的实质上的隔膜,但它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启蒙时期仍然产生了相当积极和进步的影响。这显然是近代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大同思想在中国则具有深长的历史源流,这一显著特征是不能忘却的。当然,近代意义上的大同思想是以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以人的全面实现的人性论为哲学思想指导,以民主观念为政治原则,因而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然的。近代大同思想的基础是博爱主义道德原则。当然,从中国近代人道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来说,则是个人主义(个性思想及其发展,自我觉悟及其价值实现)与大同理想的密切结合,这一结合成为人道主义思潮的主线。

在近代中国,个性解放与发展的思想演变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在揭明欧洲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时,便可清楚地看到启蒙思想家们把人的理性存在视为人的价值的依据,反对盲目信仰,抬高理性地位,从而确认人的自主性原则和思想自由原则。而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启蒙思想家们能够直接从理论上加以指

明和维护。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市民社会思潮的发展中,也已经把它做为实际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态度。此外,力量迅速增长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肯定并提高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个性解放发展的思想与自由、平等、权利的思想相结合,发展为个人主义基本价值观。相形之下,个性解放与发展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崭新课题。虽然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尊重个性是道德思考和生活态度中十分珍贵的内容,例如在孔子的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认识,已经体现出人我关系中个性的价值意味。此外,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的思想,也强调了一定的个性独立意义。但这种生活态度和认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并没有受到重视,本质上受到封建等级伦理道德的束缚。因此,连尊重个性的观念也是隐而不显的,更谈不上有任何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明清时代,人文思想及市民阶层道德观的推移以及反映为肯定生命价值、情欲的合理满足、使“人之情无不达”(戴震)的思想中,出现个性解放的最初冲动——学术思想艺术个性的宽容和享受主义以及禁欲主义道德观念淡薄过程的个性解放的十分微弱的呼声。但是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只是怀疑了绝对专制主义而已,没有怀疑和否定等级伦理道德。正是这种于人的问题的关注不足,推迟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改良运动的历史时期,个性解放要求虽然在龚自珍那里一度成为令人震惊的呼声。然而,总的来说,无疑还是被忽略了。因此,启蒙运动的最突出和最尖锐的思想任务,就被历史地规定为个性解放的实现。这一实现的过程是从批判封建专制伦理开始的。

改良派思想家们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尖锐地洞察到封建伦理道德是封建主义不人道本质的最集中体现。等级伦理的存在,把人的全部权利制约在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不能发展的专

制秩序中；从属于它的道德准则，是一种绝对命令，即与专制特权一样具有法的功用，并通过这种道德法否定人的生命权利。因此，对个性发展来说，它是一种“罗网”，谭嗣同是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最激烈的一位。他所提出的“冲决网罗”的呼声，其实正是个性解放的号角。而且其中包含相当深刻的民主思想。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个性解放的过程，要在挣脱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同时，在平等原则、自由权利的保障下加以实现。

当然，个性解放与发展的主张，一开始就与大同思想结合在一起。因为现实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等级伦理道德对于个性的压迫，不是单纯依靠思想道德认识的转变所能解除的，而必须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这是思想家们模糊认识到的。他们所发动的改良政治运动及其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启蒙思想，都是很深刻的历史认识。因此，表现在康有为《大同书》中取消家界、国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去苦获乐（其幸福观中包括了平等自由等等个性解放的实现内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爱的伦理启蒙，同时也是这一共同认识的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同理想的意义，不仅反映了改良派无法提出具体的变革社会主张并找到力量，但又急切的需求达成这一理想的幻想性追求，而且在这幻想的形式下解决了现实条件下个性解放与普遍幸福之间的矛盾。

其幻想的力量，来自他们博爱主义的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原则。他们承接了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以及韩愈的“博爱之谓仁”的学说，并加以发挥，以之为大同实现的依据。因此，康有为说：“仁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大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孟子微》卷一）这是道德原则。而“不忍人之心”无疑又是心理依据。而“人人既是天生，则

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然”（同上），等等，则又设定出了人性论的同时也是伦理的依据。正是这种心理的以及道德上的强烈要求，削弱了由个性解放开始的个人主义到大同之间遥远途程的现实力量。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在哪怕是理想主义思维方式帮助下得到解决。

当然，改良派的大同思想受传统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大同思想有极长远的传统。《礼记》的《礼运》篇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绘是最能代表小农社会中的人道理想的，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财力为公，盗贼不兴。等等。这是关于大同的素朴观念，也是小农的幸福观。在这乌托邦的幻想设计中，把道德上的理想成分视为依托，并在现实的痛苦当中表达出对于原始公有制的神往意愿。但它的意义则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表达了对于一个和谐、富足和道德的大一统的依恋情绪和实现愿望，而这个大一统能够保证小农们的利益，以及在这利益基础上的所有人的幸福；其二是，它成了中国大同思想的源头，并对后世的大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封建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给人多少发展乌托邦的想象力，因为代表小农们的幸福观的，无非是在这基础上增添了表示着对于专制压迫憎恨的无君观念而已。直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社会历史环境出现新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爱的观念影响下，关于乌托邦的追求才有了些微的新意。但即使如此，其用来作为理想力量的理论宣传内容也没有脱离小农的思维水平限度。《原道醒世训》中描述的境界是：“遐想唐、虞、三代之世，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

女别途，举选上德。尧舜病不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饥溺，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乎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理化，远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一则是对于等级伦理社会专制的否定意识，但这种否定没有引向个性解放，而表现为小农社会的理想，故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之后，引《礼运》中孔子的话为证佐。^①二则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对于专制主义批判的观念意识与消除战争的和平理想，对近代的大同思想来说是个先声。但太平天国的乌托邦思想的境界是在和睦相处与共同幸福，而没有多少涉及个性思想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大同思想缺少人性论的理论依据；尤其在革命实践中缺乏民主意识，这是其最根本的局限性。

因此，改良运动时期大同思想中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是近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们关于解除伦理专制，追求平等、博爱；人性论的提出等等这些旨在实现个性从封建专制中获得解放，并在和平社会中发展，以及普遍幸福实现的思想，是关于大同社会的人道实现的重要思想成就，是具有相当时代意义的。但改良运动时期大同思想与个性解放主张之间的矛盾，也比以往更为凸现。

辛亥革命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得到发展，个性解放思想与大同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在个性解放方面，邹容提出了摆脱奴性的个性独立主张，而章太炎通过佛教思想中的“依自不依他”理论，论证了这一命题。如果说批判等级伦理道德对个性的束缚是争取摆脱外在压迫意义上的解放，是个

性解放的初步的话,那么,从内在心理道德和行为活动中舍弃奴性成分,达到自我意识和人格独立高度上的个性解放,则是完全近代意识的觉醒和解放。这一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蔡元培提出个性发展问题并阐述了个性发展所必不可缺的知识提高、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思想自由等等关于这一发展的具体要求。他的启蒙思想直接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把个性解放发展与普遍幸福追求相结合的思想自觉,则强烈地反映在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痕迹十分鲜明,他的思想从总体来说是突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性格。在思想的深度和把社会变革与大同社会理想相结合方面,他比康有为成熟得多。如果说《大同书》与《三民主义》在接受西方博爱主义影响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特征、而且都暴露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抽象性的话,那么,孙中山把大同理想的设定做为实际的政治纲领加以实践这一点上,更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而其指导现实变革的意义也就比前者要突出得多。^②从思想的实质内容来加以分析的话,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性格。在寻找大同的博爱理想和普遍幸福的实现力量上,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强调献身精神,强调为民众牺牲个人的道德情操,在这方面,比起改良派的救世观念以及从佛教那里接受的慈悲情感要强大得多。他们还强调人的互助的本质及由此产生的互助精神,同时也提倡互助道德,在这一方面,朱执信可为热烈崇信的代表。这是个性解放与发展思想和大同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刻化完善化的重点所在。但革命派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统一,各自追求的侧重点并非一致,因此,个性解放发展与大同社会实现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紧密,这仍然是启蒙思想与现实追求之间

的矛盾，或者说启蒙思想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导致的认识上的裂痕。

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以主张个性解放、个性发展为思想基点。他们自觉地接受西方近代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之为理论武器。他们从中国现实出发，重新提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的历史课题，而且集中启蒙思想的全部力量，比改良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都更突出、更尖锐、更深刻、更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非人道本质（礼教‘吃人’），压迫泯灭个性的罪恶（造成精神麻木）和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奴化）。他们不仅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方案，而且在这民主思想的指导下，把个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的独立视为个性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也丰富了女权主义思想。这是个性解放的呼声，他们进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即自由、平等、人权等等的权利要求。而实现个性发展所必要的社会制度，在他们那里，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现实主张发展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宣言。这是他们把个性的真正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消灭阶级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能够保障人的物质需要以及人的自由发展的公平合理的人道社会制度，来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这样，个性解放和发展这个注重思想道德的概念，发展为保障人的发展和实现这个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而人的概念是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联结的。因此，李大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倡人道主义相结合的高度文明，这样，我们看到了从个性解放和大同理想出发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两条主线的历史发展，其结合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陈独秀与李大钊无疑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初传播者。